

■聊书

数学无处不在

张一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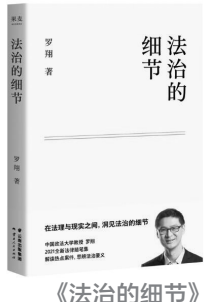
人们总以为刑法距离现实生活很远。其实,不远。你、我、他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或旁观者。比如,关于死亡。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刑法理论中采取的是医学上的标准。但有趣的是,在医学中,死亡分三档,第一档是脑死亡,第二档是临床死亡,最后是生物学死亡。这三档是个不可逆、渐进的过程。那么,究竟应该以哪一档作为死亡的标准呢?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你会仅以脑死亡标准接受死亡这个事实吗?这个问题尚无一定之规。本书作者罗翔从道德、法律、伦理、社会影响等多个角度对死亡涉及的问题逐一分析。分析后,他对此类争议通常会提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引发读者思考。

罗翔是政法大学刑法学老师,

也是一名新晋网红。作为老师,解释法条容易,若涉及法律事务,不仅要吧干巴巴的法条解释清楚,还要结合多种社会复杂情况,这就考验一名网红是否真正接地气了。

书里的很多热点,如代孕是否合法的问题、性侵害案中女性的合理反抗标准是多大程度、见义勇为的尺度如何把握等,都有作者的独特见解。

学法律的人,果真是人间清醒。



《法治的细节》

一提起数学,脑海里闪过的是不是难记的、枯燥的公式呢?但如果您能认真看完这本书,再次提起数学时,一定会觉得数字也好、公式也罢,都会像天空中璀璨的星星一样熠熠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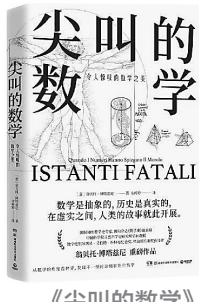
这本书的作者是国际知名数学史专家翁贝托·博塔兹尼。书的原名是意大利语,直译过来叫“宿命时刻”,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看完书我明白了,人类伟大的发现不是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力量,而是一连串的事件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发酵,然后突然成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书里面一个个小故事非常有趣,让人感叹:数学,真是无处不在。《奥德赛》中机智的奥德修斯告

诉独眼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没有

人”,透露了人们早就认知了虚无。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的画像,为数学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自然界中,一朵花、一片叶子生长的形状,葵花子的排列方式,都跟无理数有关。

达·芬奇说过“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数学的发展也成就了物理学和天文学,不禁勾起我的好奇,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弯曲空间、想象空间是什么样的?未来,又会出现哪些“宿命时刻”呢?



《尖叫的数学》

想象一下,在这座离埃菲尔铁塔337米的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工作,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本书中的亚米利加图书馆是一所私人图书馆,至今仍在开放,也是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英语图书馆,员工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我特意上了一下官网,有一页是员工展示页,他们的一张张笑脸映入眼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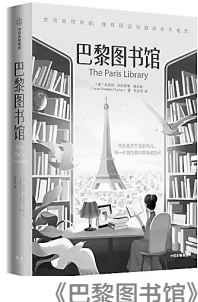
时间将我带至1939年,女主人黛尔怀着对书籍和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的热爱应聘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在纳粹占领巴黎期间,她与她的同伴为巴黎城里的爱书人守候最后的精神港湾,同时也在做着最危险的事——为犹太人送书。

另一条主线发生在1983年的美国小镇,少女莉莉的一次意外闯入,阴

差阳错阻止了奥黛尔的自杀。通过二人的逐步交往,慢慢揭开了她离开巴黎的真正原因。

书中不时穿插着我们熟悉的莎士比亚、奥斯特、勃朗特、海明威、狄更斯和卡夫卡等作家作品,是奥黛尔解决生活烦恼的良方。这就是书籍的力量吧。让我想起了《查令十字街84号》,书友之间是可以有心有灵犀一说的,好的书籍是可以穿越时空地与你相遇的。

唯书籍和爱不可辜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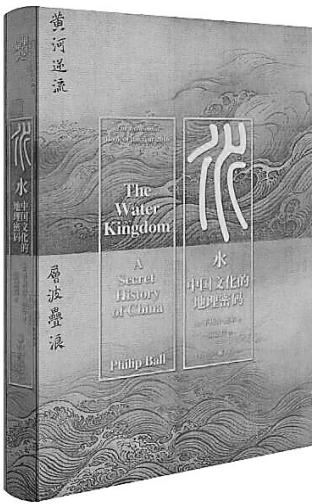


《巴黎图书馆》

# 浸入文化缝隙的水

王海宁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水渗透进了每一个缝隙。从黄河到长江,水孕育了中华文明,也决定了我们的习俗和生活模式。《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从地理、神话、哲学、政治、经济、管理、战争、艺术等多个角度,探索水在中国文化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进而梳理出一条中国历史文化浩荡而丰沛的脉络。



## 作为文化推手的水

“水哉,水哉”,孔子曾经这样感叹。世界上最简单的化合物,化作江河湖海,便成了推动世界的源泉。水,既可是文明源头,也可是灾难忧患;滋润万物,也泛滥成灾;是运输交通的航道命脉,也是一决胜

负的战场。

《水:中国文化的地理密码》的作者菲利普·鲍尔是一名英国科学家,取得了牛津大学化学专业学士学位和布里斯托物理学博士学位,是顶级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自然》的顾问编辑,著有余十余部脍炙人口的科普读物。他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来中国做访问学者,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中国文化有着浪漫的想象,走近之后,愈加着迷的同时也越发困惑。尽管距离马可·波罗描述中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700多年,即使进入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人,依旧庞大繁杂,古老甚至神秘。菲利普一直试图找到能够豁然开朗进入中国文化宝库的密钥,慢慢地他意识到即使他再花上个几十年,也很难对中国文化做出一个概貌全面的描述。

最后菲利普还是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小切口的文化史研究。菲利普详细谨慎地选取了水作为解读中国文化基因的编码单位。就像千变万化的水本身,“水”在历史不同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这其中有些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有些事实则得到别开生面的解读。菲利普笔下的中国文化里的水,就像游客相机里的高清照片——它与现实既相似又不同,既真实,又有全新角度的映照。我们在自己住惯的房子里,常常觉得一切都自然而然,菲利普就像一位热心的访客,在认真了解你的偏好、品位、年龄、收入后,拍下了他认为有特色的无数局部照片,而这其中,我们也会重新发现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历史痕迹,我们忽视的好恶习惯。菲利普,用水带来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新颖“洞见”。

## 水运航道就是“高速公路”

尽管中外的古老传说中,都有“大洪水”,但是如何赋予统治者权威,水扮演的角色,却有着本质不同。

西方传说中诺亚方舟的洪水,是对人类之恶的惩罚,只有善良的人才能逃脱——洪水神话鼓励的是尊重无上的权威,赋予幸存者道德的优越。在中国神话中,洪水本身是一种恶行,而“治水”之人,让狂暴的水安静下来,让混乱归为有序,免除人们的恐惧——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本身就是“权威而有德行”的人,治水者的形象如同结束社会动荡的统治者——“对大洪水的驯服代表了动荡时代对社会秩序的梦想”。治水者成为权威的贤明统治者最早的原型就是“大禹治水”。而后来神话不断发展,龙治水,龙是中华文明的图腾,更是有着威权意味。

菲利普显然下了一番功夫,发现了许多遥远的呼应。他从《史记·秦本纪》“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电游。尔后嗣将大出”的表述里意识到,这其中的“大费”即“伯翳”,是传说中禹的助手,后来“舜赐姓嬴氏”,这一支后裔后来成为诸侯,发展成秦国,而秦始皇是“嬴政”,统一了中国。这条记载,今天读来不过是遥远传说与历史的一次交融而已,但是菲利普指出,显然秦始皇认可这一传说,因为宣称自己就是“大费”的后人,将自己与高尚的先贤血脉相连,对自己的统治有利不言而喻。今天读来无稽可考的传闻,当年却可能是王权正统性的一个重要佐证。

菲利普广泛了解了中国的神话、历史与民俗。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傣族的泼水节,从黄帝战蚩

尤请出旱神“魃”,到李冰修建都江堰,无论是远古神话还是封建官僚政治,漫长的历史中,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周期性的洪水与干旱,对于沿岸的百姓来说,是命运的在劫难逃;而修建大型水利设施、开凿运河、造船出海这些举措都需要贤明的政治环境、有开明的官员、繁盛的人口基础以及充裕的财政支持,因此对大江大河的正确治理总是与盛世紧密相连。

水将“道德行为”“水资源管理”“国家权力”三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统一了起来。

当中国的帝王定都北方时,无论是在西安还是北京,都需要将粮食从中原和江南运送到北方,陆路运输需要人力、畜力,成本极高,而水运粮食就成了更经济的选择。从汉代开始开凿的“漕渠”,形成了系统的漕粮运输系统,维系住了大江江山。而长江的拉纤纤夫,这一苦不堪言的职业一直持续到民国。

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隋唐大运河,耗尽了隋朝的气数,却在接下来的数个王朝之中,形成了江南的运河城市繁华,成为连接中国江南和北方权力中心的大动脉。水运发达带来经济繁荣,沉淀了财富,也开风气之先,江南繁华的商业文化的发达,正是伴随水网运输的发达而逐渐形成。

## 水战有了新的戏剧外衣

中国历史上许多转折性的战役,是惊心动魄的水战。许多几乎是妇孺皆知故事,比如三国的“草船借箭”“赤壁之战”,而这些在菲利普的叙事视野里重新有了荷马史诗的味道,“兵不厌诈”“人心向背”在菲利普看来如同一场在长江流域上演的特洛伊之战或者亚瑟王传奇。

# 回望中国商业的历史脉络

曲 宏

■提示

自商周以来长达3000余年的中国商业史,也是一部商业文化史。李强所著的《中国商业文化简史》以时间为轴,爬梳中国商业史以及附着在传统文化上的中国商业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从夏商周的重商时代、秦汉的抑商时代到唐宋的繁华时代、元明的商业转型时代和清朝的迅速发展时代,反映了几千年来朝代更迭与商业的关系,在其发展的描述中,中国商业与中国文化的始终交融清晰再现。

## 中国商人也有过“黄金时代”

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在谈到清朝的商业时认为,到了清初中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商业化的国家。他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介绍,虽然中国是最典型的农业社会,但在18世纪末,清朝1/10以上的谷物、1/4以上的生棉,一半以上的棉布、超过9/10的生丝,以及所有的茶叶,都是为了在市场贩卖而生产的。这些数据也许会颠覆人们严重低估中国商业思想的观点。李强告诉大家,中国古代历朝历代“轻商”“抑商”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中国商人也有过“黄金时代”,特别是在秦朝统一前,商人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在社会上

价不低,深受百姓欢迎。李强从商人的社会地位变迁、商业都市的发展、商品种类的变化以及货币的变化史,对中国商业发展进程和商业文化演变做了清晰的梳理。

本书以商业发展时间为轴的线性脉络,便于人们理解。商业与商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商朝之前,平等交易、等价交换的商业文化就深入人心。在夏朝时,它属下的部落商族人的首领王亥就驯化了牛,带领部落赶着牛羊到其他部落进行交易,给其他部落带去运输工具和生产工具,夏朝的其他部落都喜欢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乡人,这在《山海经》中有所记载。商朝人以经商发家,自然重视商业,国君在宫城中修建“九市”。周朝时经商更是被当作国家的重要事务,商业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农业和林业差,“商贾”在当时的“九职”中位列第六。重商的文化孕育了重“义”的商人,他们无私支持国家,郑国“弦高犒师”的典故就是例证。古代商业的发展和并非一帆风顺,从战国晚期到南北朝期间开始“重农抑商”。商鞅主张出台法令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刘邦也出台“贱商令”,不让商人骑马、坐车、穿着高级服装。如果说秦时对商人是迫害与掠夺,到了汉朝就是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打压。到了唐宋时期,“抑商”局面才得以改观。唐朝商人地位逐渐提高,富商大贾“常与朝贵游”。到了宋朝,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可以

出任官职。至于婚姻,富商人家与士人或官宦之家联姻也大有人在。不同朝代统治者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出台不同的商业制度。因而,不同朝代商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就有当时执政者追求的利益所投射的影子。

说起中国古代的商业盛况,《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商业盛况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商业发展里程碑式的标记,那是与今天节假日时的商业街不遑相让的繁荣。中国商业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样态,未必总是奔向目标前行,附着而生的商业文化也如此,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史记·货殖列传》描写西汉通邑大都的商业状况,涉及酿酒、酱菜、牲畜、布匹、水产、瓜果、蔬菜等数十个行当。到了唐朝的东市、西市,更是规范的商业专区,宋朝的城市工商业则可以自由选择经营地点,时间也不再受限,“夜市”的合法性得到官方认可。元朝更是凭借着青花瓷器,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把商业触角伸到了国际市场。明朝时白银成为货币主角后,中国的商业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清朝到了雍正时期,中国商业经济完成了巨大转型,跨区域贸易在商业中占比逐渐增高,清朝最著名的两个商帮“晋商”“徽商”,更以“重诚信、讲道义”的商业文化发展绵延了一两百年。

## 诗词书简里的商业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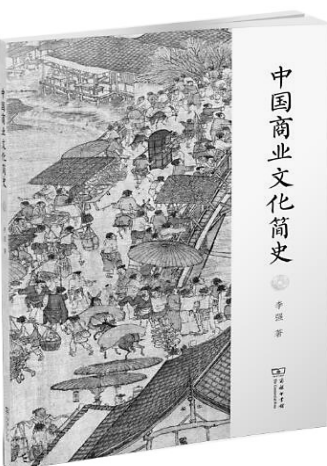
商业文化由来已久。但李强认

为“商业文化”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那么,中国商业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呢?李强认为,要了解中国商业文化史,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核心价值观,而“义利并兴”“候时转物”“以和为贵”和“诚实守信”,就是构成中国古代商业的核心价值观。

自古商人喜欢在店铺里挂两个条幅,上书:“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陶朱就是范蠡,端木就是子贡。范蠡当过越国的上将军,帮助越王“卧薪尝胆”,成为一方霸主后,他及时隐退,成为商人。在商而不耽溺于商,求利却不蝇营于利,范蠡才是真正知晓“上商近道”的人。子贡复姓端木,本是卫国普通人,可他成为孔子学生后,追随孔子“问仁”“求仁”,富而不骄、富而好礼,成为后世商人的楷模。这样的从商之道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春秋时,郑国商人弦高为阻挡秦军偷袭郑国而献出自己的牛羊;汉武帝时期真诚无私的商人卜式,为支持攻打匈奴而捐出一半家产。此外,还有对唐朝的小商人窦义创业史的叙述,从13岁卖掉亲戚给他的那双新鞋子开始,用了十几年时间,历尽辛苦,成功打入京城富商行列,发财后不忘救济穷朋友。这些历史上的著名商人共同开辟和延续了中国的“义商风尚”,取舍之道影响深远。以尽可能大众化的方式,以当下的视角,将中国几千年的商业文化做了通俗表达,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古代的诗词歌赋中也不会不时

地流露出当时的商业气息,从文化名人的诗词书简中可以捕捉到那个时代的商业烟火气。通过“笑入胡姬酒肆中”,我们了解到当时长安城内有许多西域商人做生意,通过“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了解唐朝酒馆也可提供葡萄酒,用金制的酒器,当时珍贵的葡萄已进入百姓生活。欧阳修的书简则另有一番意趣,他给朋友送鱼干“尝鲜”,送数十乃至上百管毛笔,还谦称“起草可也”。好友送来珍贵的茶叶,他要还回去一半,一方面反映了宋朝的茶叶市场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精英英人物的消费品位。在这些“文化人”的字里行间,早已消逝的商业“烟火气”和文化韵味仿佛穿越时空,扑面而来。



《中国商业文化简史》

这样的行为,类似回忆的“复调”——记忆发展的另一声部的旋律线,然后,它又与原声部的旋律紧密织就,成为一个整体的音乐织体表现——而回忆与过往事实也就同时成为一个。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学者齐格弗里德·施密特的研究指出:“个体之间互相期待的集体知识”将“引导着他们的认知过程,决定着何种东西被回忆或者叙述为‘过去’”,并“由此生成认知性的秩序”;而记忆,其实是“通过行动者对它的应用来实现自身”。对于明清文人,他们可能就是以这样“复调式”的行动打造出一个关于传统的“记忆之场”。换句话讲,这一记忆场构成了其时较为稳定的传统意象表征系统,进而成为了传统的某种“时间故乡”,在其中,一切都不曾失去,且还得到了构想性的、再造性的保存。

作者在《后记》中叹明清文人传统之渐远,自述著书之意是:“但读书阅画讲故事,是把船靠在岸边,看暮蒲深处寒星闪闪,听人歌人哭水声中。”其实亦不必太过感伤。身体力行的日常热忱经验和行动,是明清人对传统记忆的一叶舟。今日如有此念想,心中持定,也可以有今人的记忆“书画船”吧。